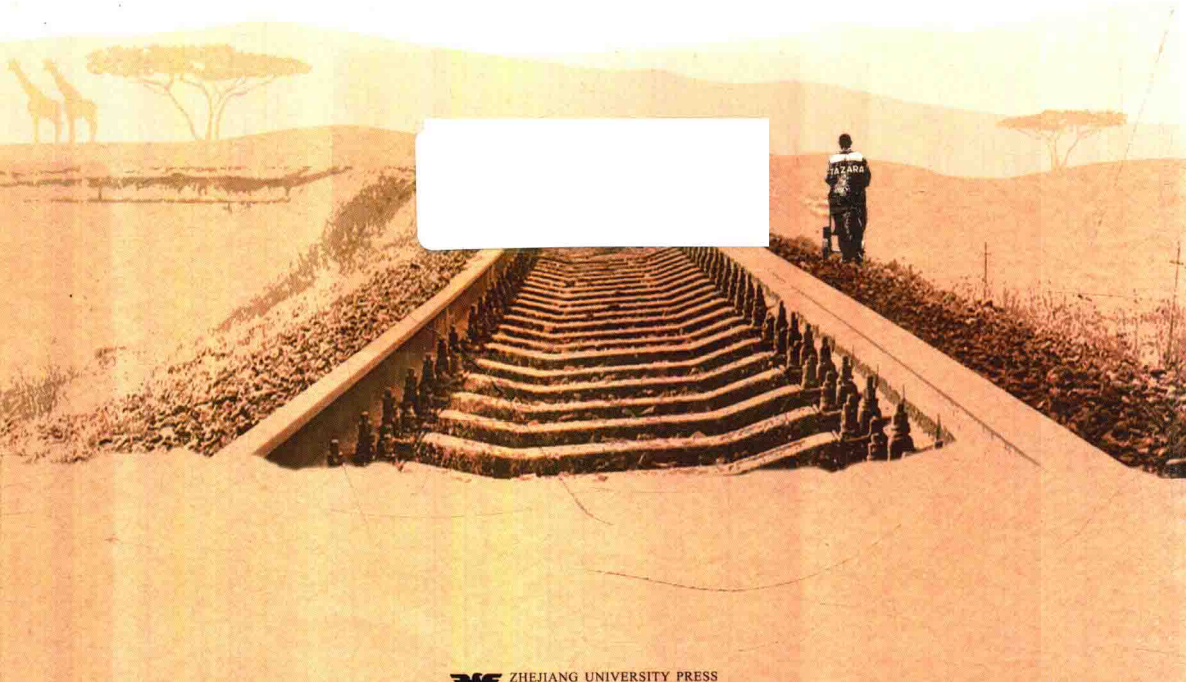
UHURU:
THE STORY OF TANZANIA-ZAMBIA RAILWAY

中非之路：
坦赞铁路
沿线访谈录

张　勇◎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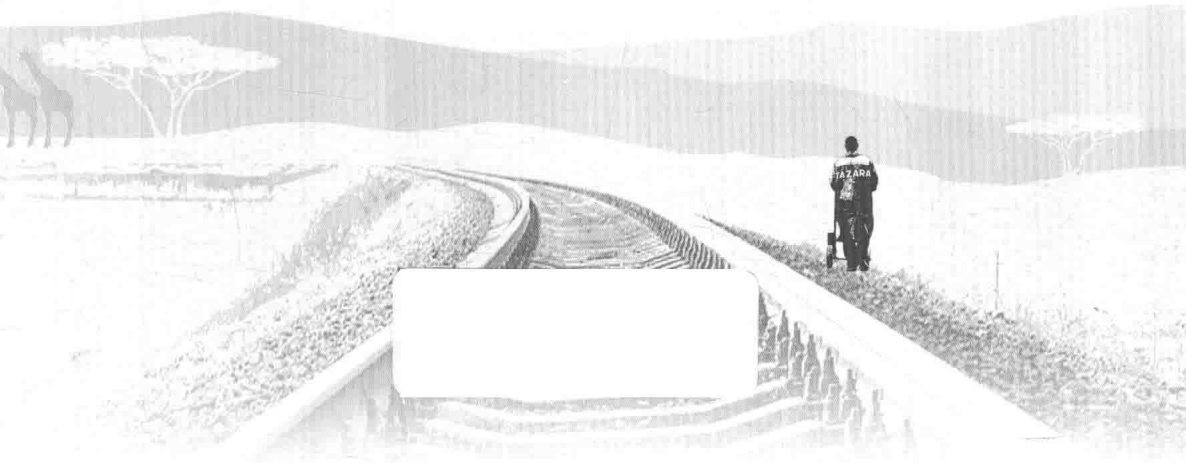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UHURU:
THE STORY OF TANZANIA-
ZAMBIA RAILWAY

中非之路：
坦赞铁路
沿线访谈录

张勇◎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非之路 : 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 = Uhuru: The Story of Tanzania-Zambia Railway / 张勇主编.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8
ISBN 978-7-308-19104-3

Ⅰ. ①中… Ⅱ. ①张… Ⅲ. ①人物－访问记－非洲－现代 Ⅳ. ①K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1033号

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
张 勇 主编

策 划 张 琛 包灵灵
责任编辑 包灵灵
责任校对 吴水燕
封面设计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12
字 数 256千
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104-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坦赞铁路之书

姆贝尔瓦·凯鲁基*

坦赞铁路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援非的里程碑项目。当时，受到泛非主义思潮的启发，坦桑尼亚总统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已故）和赞比亚总统肯尼斯·卡翁达双方就建设连接两国的铁路项目达成共识，并向中国提出了援助请求。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本着真诚友好的合作精神，中国政府愿意慷慨解囊，为该项目提供无息贷款。正是中国领导层的战略决策，使得该项目能够顺利实施。

这条贯穿东非和南部非洲的交通大动脉，全长1860.5千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为南部非洲国家的社会发展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对坦赞铁路建设的支持为中非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友谊，坦赞铁路被非洲人民誉为“自由之路”和“友谊之路”，成为中非友好的见证。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疾病多发，施工队伍面临各种艰难挑战。铁路沿线几乎杳无人烟，荒郊野岭里毒蛇猛兽肆意横行。尽管困难重重，专家队伍们依然全身心投入到建设中，并完成了这项长达5年8个月的艰巨任务。在这项旷日持久的建设中，共有66名中国专家长眠在异国他乡。

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坦赞铁路需要在管理和技术运营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和创新。“一带一路”倡议让中非合作再掀高潮，坦赞铁路将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张勇博士主编的这本书，采访了涉及坦赞铁路的各个方面的群体，包括坦桑尼亚建国后的首任总统尼雷尔的夫人玛丽亚女士、坦桑尼亚前总理萨利姆、坦赞铁路建设时期的交通部长等大量历史亲历者，以及沿线的居民、乘客、媒体从业者、铁路工作人员等，对于中非年轻一代了解坦赞铁路这一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中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坦赞铁路是一座象征着三国深厚友谊的桥梁，我们继续展望它美好的未来。

---

* 姆贝尔瓦·凯鲁基，现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驻华大使。

序
FOREWORDS
二

打开尘封的记忆

苟皓东*

张勇博士发来《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书稿，说是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的“副产品”。读着书中那些熟悉的谈话，拍摄纪录片时的许多画面再次浮现在脑海中。时间真快，一年多又过去了。

《重走坦赞铁路》纪录片在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开拍的第一天，正好有一群德国年轻人在等火车，出镜导演尼尔斯走上前攀谈。

尼尔斯问：“你们知道坦赞铁路是哪个国家修建的吗？”

德国青年：“德国吧？”

尼尔斯：“不，是中国。”

德国青年：“中国为什么要修这条铁路？”

……

我亲耳听到这段对话。

在距离火车站10多千米的中国专家公墓，长眠着60多名为坦赞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墓地附近有一所小学，我曾经出席过中国商会捐赠课桌的活动，我问在场的师生：你们知道公墓里安葬的是什么人吗？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中国有好几个铁路博物馆，上海铁路博物馆和北京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我都看过，没有关于坦赞铁路的只字片言。

中国人民曾经家喻户晓、非洲兄弟曾经欢欣鼓舞的坦赞铁路，如今几乎只是个传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道义

---

* 苟皓东，现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登巴萨总领事。曾任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利比里亚、博茨瓦纳大使馆政务参赞，驻非盟使团副代表，驻坦桑尼亚使馆公使衔参赞，在非洲工作长达14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物资上给予非洲兄弟坚定支持。1999年，我到非洲当时最年轻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工作，那里的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游击队战士出身，总统伊萨亚斯本人22岁时曾经到中国学习，结束后，带着“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和《论持久战》回到战场，继续领导独立斗争，终于在1993年建国。后来，我先后在非洲五个国家工作和生活，每到一处，都经常被中非往事感动。在博茨瓦纳的时候，马希雷（博第二任总统）先生亲口告诉我一个故事：博茨瓦纳独立后，与中国台湾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后来，卡马总统（博首任总统）应邀出席坦赞铁路通车典礼，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狠狠批评了他，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非洲人民最可靠的朋友。卡马总统解释说，自己当时急于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没想到犯下如此错误，回国后立刻宣布与中国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坦赞铁路的道义感召力可见一斑！

中国劳工在100多年前就曾到这片土地上修筑铁路，那时德国殖民者为了掠夺财富，征用大批拖着长辫子的中国苦力（coolie）修建中央铁路（1905—1914，干线全长1252千米）。到底有多少中国苦力参加了中央铁路的建设？以这条铁路的规模和当时的技术条件以及建设时间来看，应该是数以万计，而且伤亡无数，据说曾经在铁路沿线发现过不少中国苦力的墓葬。历史的巧合总是让人唏嘘感叹不已。半个多世纪之后，为了帮助非洲兄弟获得主权和捍卫尊严，5万名中国人再次来到这里修筑铁路，60多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非洲人民给坦赞铁路起了光荣的名字Uhuru Railway（自由之路）、Urafiki Railway（友谊之路），西方则视之为“红色铁路”、非洲的“胡志明小道”，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尼尔斯在采访中了解到罗德西亚白人政权策划的炸毁坦赞铁路一座桥梁的事件，而且寻访到当年机智驾驶列车逃过一劫的赞比亚女司机。尼尔斯愤怒地说：这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坦桑尼亚是南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FRELIMO）、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许多秘密据点就隐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背街小巷里，穆加贝、萨莫拉、曼德拉、内图都是尼雷尔总统的常客，甚至秘密潜入非洲的格瓦拉都在这里活动过。坦赞铁路指挥部大院的中国医院救治了无数当地人民，也为许多自由战士提供了医疗服务，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至今感念坦赞铁路医院救了他的性命。坦桑尼亚的国防军英勇善战，一举打败阿明政权发动的侵略，因此得名“坦桑尼亚解放军”。我在坦桑尼亚工作的两年里，经常去看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利姆先生、“国母”尼雷尔夫人、乔治·卡哈马（George Kahama）先生（尼雷尔总统的亲密

战友，首任内阁部长之一，20世纪80年代出任驻华大使）。我去看望前总理马莱塞拉（Malecela）时，老人称自己是毛泽东的粉丝，中年时期从发型到服装都模仿毛泽东，他的夫人至今还能说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产半自动步枪的型号。坦赞铁路建设时期的交通部长卢辛德（Lusinde）先生（后来曾担任驻华大使）已经是耄耋之年，他清晰地记得坦赞铁路的许多往事和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友谊。当年非洲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伊萨克·什维吉（Issac Shivji）教授、著名出版家沃尔特·博格亚（Walter Bgoya）先生均已年过古稀，他们都是当年民族解放运动的亲历者，也是中坦友谊的见证者。能与这些前辈交往，聆听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史料，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是激励我努力工作学习的精神力量。《重走坦赞铁路》在拍摄过程中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管窥一些史料。

尼雷尔一生13次访问中国。1965年第一次访华后，他不再穿西服，自己设计了一种无领套装，居然迅速在非洲流行起来。这种被西方称为“毛服”的套装，至今在非洲仍到处可见。尼雷尔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访华回来后大幅降低政府公车数量和档次，宴会取消酒精饮料，宣布《阿鲁沙宣言》，推行坦桑尼亚式人民公社（UJAMAA）。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尼雷尔说，非洲国家没有全部独立，坦桑尼亚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独立……尼雷尔的名言“坦桑尼亚有许多朋友，中国是最好的朋友”被坦桑尼亚历届政府作为“国父遗训”而坚定奉行。

回顾历史，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长远目光和外交布局，在今天看来非常了不起。我常常对同事们说，如果西方非要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话，这个对手在非洲具有他们望尘莫及的优势，那就是道义和感情优势。

遗憾的是，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那段感天动地的历史被时间的尘埃慢慢掩去。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张勇博士团队拍摄《重走坦赞铁路》，并由张勇博士整理出版《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深度触及那段历史，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良好开端。此刻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住的酒店附近就是当年的亚非会议旧址，读着这本书，心里有一种兴奋的预感：也许，这部纪录片和这本书可能会催化对当代中非关系史的研究热潮，更多的中国学者和非洲学者会加入进来，寻找中非合作的“初心”。

半个世纪前，中非前辈们开辟了这条自由之路、友谊之路，今天，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向中非合作更加壮丽的明天。

2019年3月

印度尼西亚万隆

序
FOREWORDS
三

做行走、行动的非洲学问

刘鸿武*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总结国家民族艰苦奋斗而逐渐复兴崛起的光荣历史。当代中非合作关系是中华民族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进程中在对外关系方面所做的特殊努力，也有许多值得人们回顾总结的往事。值此特殊时刻，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张勇博士团队完成的大型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正式发布，根据此纪录片采访内容辑录而成的著作《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也正式出版，这种让宏大历史叙事与精细私人记忆共同呈现中非合作光荣历史的全貌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我作为这一项目最初的策划人，应张勇博士的邀请，将一些感受、想法略记于下，以为书序。

一

坦赞铁路是当代中华民族一份特殊的海外国家历史记忆。作为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人，我早在1990年到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留学时就听说过不少坦赞铁路的传闻，但一直到2003年我到坦桑尼亚（以下简称坦桑）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做访问教授时，才对这一当代中非合作的历史丰碑和相关细节有了真正直接的感知与观察。

在坦桑期间，我在当地朋友和大使馆文化处帮助下，曾对中国援助坦桑的多个重点项目做过调研考察，如坦赞铁路沿途车站、达市友谊纺织厂，拜访过当年坦赞铁路的见证人桑加大使、萨利姆先生、坦桑开国元首尼雷尔的夫人，也前往坦赞铁路政府办公室访问过相关官员，清明节时与当时中国专家组组长杜坚先生一起到郊区祭扫

* 刘鸿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还与非洲朋友一起乘坐客运班车前往沿线小站感受民风民情，在伊林嘎山区感受中国铁路数十年来给这个国家的边远山区沿线带来的变化，也渡海到桑给巴尔岛感受600年前郑和远洋抵达东非海岸留下的文献和其他历史遗迹。从坦桑回来后，时时思念那片留有太多中国历史文化痕迹的东非海岸的人与事、自然与历史，陆续写了一些文字，最后写成了《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书中收录了当年在坦桑留学考察时对坦赞铁路调研考察的一些文字。

后来我又多次去坦桑，有一年到坦桑承办中坦合作研讨会，时值坦赞铁路建成通车40周年，研讨会后，我在中土集团朋友的陪同下，前往达市港区附近的中国铁路大院，在里面看到当年中国援建大军留下的许多珍贵文物、工程器械、设计图纸，那棵移植过来的据说是当年坦赞铁路开工时在举行典礼仪式的大树，虽然已经枯萎，但所有这一切都静静地躺在热带非洲的异国他乡，而当年那热火朝天奋战海外的中国建筑工程师和筑路大军们的形象，依然流传在那片遥远土地的人们的心中、记忆中，让后来者听到都心生敬意。

这些年，我一直希望能够在国内建设一个坦赞铁路博物馆，这件事，也曾得到中土集团前董事长刘志明先生，我院客座研究员、原援建坦赞铁路斯语专家王晓明先生的大力支持，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王克、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公使衔参赞苟皓东也很关心，给予过多方面的支持。虽然这一计划迄今尚没有实质性推进，但收集相关资料、采集历史文献、访谈当事人的工作，我们还是一直在努力推进，并取得部分成果。张勇博士主持的这个中非欧三方学者共同完成的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及文字版图书《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大体就是我们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这两项工作能完成，关键是张勇博士及其团队本身的敬业精神和勤奋工作，这是一个民族奋斗精神在当代延续的一种努力。我们希望在现有的历史记述之外，通过特殊的努力，用更加精细的私人记忆，重现那宏大历史的更多细节。

二

记述和理解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历史，离不开对百年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

我们知道，通过百年努力，今天的中国正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依存关系，秉持中国人千百年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老遗训，今日之中国自当以自身取得的发展来努力带动他国他族之发展，又以

他国他族的共同发展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开阔的机会，从而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和人类交往新法则，这是时代变化的需要，也是民族命运之使然。而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的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正是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与他国他族交往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体现中华民族古老传统与现代复兴梦想的中国对外关系新形态。

作为世界史上最古老且绵延迄今的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终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信念与责任意识，来建构和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及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其他民族其他族群的关系，由此而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对外关系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传统。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中国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与日见开阔的全球视野上，来思考中华民族在复兴自我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之平衡，努力承担起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责任，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早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曾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明确表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多、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大国，“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坦赞铁路是中国对非援助的第一大工程，也是中非关系史的丰碑。自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对非援助迄今已持续半个世纪。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及其履行国际责任的问题，国际社会

有种种议论。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援助和国际责任的看法，常常是戏剧性、情绪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有时他们指责中国对外援助太少，说中国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有时又指责中国援助太多，将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夸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由此来暗指中国野心太大。许多时候他们也指责中国的援助不按规矩行事，破坏了西方在亚非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推进人权事业和实施良政的努力。事实上，对西方来说，首要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大小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多寡，而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会不会成为与西方模式不一样的“另类”。

近年来，在国内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争议也时有发生。时常有人会问，中国还很穷，为什么要援助其他国家，有必要吗？对于一个利益与观念日益分化和多元的时代，我们必须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做令人信服的阐释。目前，由于许多亚非拉国家要比中国更弱小更贫困，因而这种合作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但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回馈推进作用。根据一般的国际援助惯例，发达国家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美元的援助，那么最终会带动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加6美元的规模。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开始增多，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后，每年中国对非援助逐渐达到几十亿美元的水平。这些援助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了就业水平，为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到了2014年则超过了2200亿美元。这是既有利于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双边合作的好事情。

尽管远非尽善尽美，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有基于中国现代发展需要的战略诉求与实践方式，更有源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与理念基础，其得失也需要从现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广阔背景上来理解把握。因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广泛存在于全球层面，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它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重新认知自我，重新认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需要重新认知对外援助和履行国际责任的意义，需要认真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改进，让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

三

近年来，中国提出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系的主张。从学术与思想、知识与观念的层面上说，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就需要有能支撑、解释、服务这一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的创造与传播，这正是今天中国和非洲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界思想学术界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们说，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某一国家民族文化的知识来充当全球性的人类知识。我们需要通过全球范围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智库建设与合作，在继承和开发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合作研究，把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都链接起来、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这样我们才可以创造出真正具有全球性的人类共享、共通的知识与文化，也才能应对今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近代以来，中非双方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复兴进程，为最终完成中非双方的国家民族复兴，21世纪的中非双方都需要以更加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去继承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遗产，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对话与合作，从而共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当下，人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已是如此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民族、区域、文化与知识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 世界必须携起手来，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百年来的奋斗后，正取得历史性的发展与提升，即从过去的主要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自身发展，转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同发展；从主要通过改革、开放、跟随、学习的追赶型发展，转变为更多通过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结伴型发展；从主要依赖于资源、技术、人力、资金的旧发展，转变为更多立足于知识、思想、制度、文化的新发展。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知识与思想的自主性成长与战略引领，需要系统回顾总结中华学术传统，以中华文明演进的5000年智慧、国家治理的3000年思想、现代复兴的200年经验、改革开放的40年探索实践为基础，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着眼于未来百年中华民族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高度，重新理解和确认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在新时代的身份、角色和抱负，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四

过去70年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以来，日益丰富生动的中非发展合作实践，正对今日国际范围的全球国际合作机制的变更与创新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引领与示范影响，这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中非当代知识与思想的探索、积累、创造与传播。

第一，通过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化的合作平台，正将中非合作的双边、多边的合作领域与行为推向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精细化的层面。每届中非合作论坛都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项目相结合，前后之间既有承接性，又有变革性，凸显了中非合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务实性。

第二，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模式，实际上将过去70年中国国内建设发展的重视整体战略规划、重视政策的连续性、重视政府与民间力量结合的种种经验和做法，逐渐推广到了中非国际合作的实践中去，从而形成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中国发展经验正广泛影响到中非合作进程。非洲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日益重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经验，开始认真思考适合于非洲发展的新模式，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非洲的发展道路。

第四，中非合作论坛充分发挥了中非双方的积极性，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企与私企、非政府组织（NGO）等的积极性都调动出来，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模式，让中非许多普通人受益。

第五，中非合作提高了非洲在全球的地位，影响了非洲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方式，优化了非洲国际合作的环境，推动了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的发展。当代中非合作不仅仅只是经济、贸易、投资和设施建设，不仅仅只是物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赢，实际上还伴随着日益紧密的国家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伴随着中非双方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日益紧密的相互认知、沟通与合作。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非洲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各种研究数据表明，过去10多年，中非合作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在有些非洲国家，中国的贡献率更高。比如，与中国经济合作成效显著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后简称埃塞），已经保持了10多年约10%的年GDP增长速度。中国与埃塞合作修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条城市轻轨（也是非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城市轻轨）、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第一个风能发电站、第一个现代工业园区，并在这里援建了现代化的“非洲联盟国际会议中心”，以支持非盟能力建设，从而提升了埃塞在非洲发展中

的地位。这一切，使过去贫穷落后的埃塞日益成为非洲大陆最富发展活力的国家，被称为“非洲发展之星”。而中国与埃塞合作的成功经验，作为实践中的一个成功案例，正可以通过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平台，获得更广阔的推进空间与创新机会。

国家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思想自立与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中非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同样也是建立在日益紧密的思想与知识合作的基础上的。今天，中国正在为“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非洲也制订了面向未来的“非盟2063议程”宏伟规划。在此宏观背景下，双方要建构发展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和机遇共同体，必须建立可以交流、理解、借鉴的“知识与思想共享平台”，必须建立相互尊重的、平等互惠的“知识共享和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努力在人类发展进程、全球治理、国际体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发出中非双方共同的声音。

五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勇博士主编的《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是重新认知中国的对外援助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项难能可贵的尝试。这本著作立足于影视人热衷的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视角，改变以往主流媒体俯视非洲的姿态，深入民间，足迹遍布坦赞铁路数十个车站，重点采访了沿线40余位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物，为坦赞铁路研究和中非关系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出于他作为媒体研究和纪录片人的职业敏感，书中大量口述采访内容对于西方国家在坦赞铁路建设和运营时期的恶意谣言、反华宣传、干扰破坏，如“能修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生”“坦赞铁路是竹子建的”“中国派出的铁路工人都是劳改犯”“中国人修完铁路就都留下来殖民非洲”等，进行了披露和反驳。同时，作者以新时期“重走坦赞铁路”的姿态，完成了对坦赞铁路建设历史、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冷战时期西方反华宣传等的口述采访，从2016年起连续三年三次奔赴坦赞铁路沿线调研，用自己的双脚丈量非洲大地，完成了行走的学问，具有非洲人类学意义，从生活上讲中非，从情怀上谈学问，所谓“非洲研究”在这里便不再仅仅是一份稻粱谋的职业，而是与个人的生命和情感，甚至使命感紧密相连，也是一个新生代独有的非洲情怀和坦赞情怀的集中体现。

非洲研究是一个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其研究涉及非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影视、美术、音乐等众多领域。从研究工作所

需要的资料平台来看，我们无论从何种专业或领域切入，从事非洲研究的一个普遍困难都是资料相对匮乏，尤其是历史文献与书面材料。作为克服这一缺陷的重要努力，非洲研究者们大多比较重视借助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工具，通过收集整理口头传说、民间故事、部族谚语，以形成口述史料来补充书面文字材料之不足。坦赞铁路史的研究虽然有比较丰富的书面文献材料可用，但流传在民间、散布于非洲的当事人经历、见闻、感受，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连续剧，需要以专业的方法进行及时的整理。张勇博士团队在拍摄《我从非洲来》纪录片时已注意积累相关口述资料，在拍摄《重走坦赞铁路》纪录片时，更加有意识地重视对口述材料文字化的消化整理，因而得以在完成纪录片制作后不久，就形成了纪录片转换成书的过程。这本基于对沿线国家历史见证者和当事人的采访而成的著作，由采访拍摄转换为口述文字、书面文字的做法，正是从事非洲研究的重要路径，为研究当代中非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素材。其中的许多文字记录，形象生动，内容感人，为人们理解当年中非人民的共同奋斗精神及今日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积极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到美起来的道路上。因此，作为学术机构，首先要解决自身的基础性短板问题，不仅仅在一个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而是要扩大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中非合作涉及方方面面，铁路、公路、医疗、农业、学校等，中非合作好不好，中国是在帮助非洲实现发展还是在搞新殖民主义，不能由西方人来说，应该由非洲人自己说，坦赞铁路亦如此；没有谁比非洲人更懂得非洲，在非洲研究和非洲实践方面，非洲人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必须扎根非洲大地做学问，到非洲去虚心聆听、拜访、学习，才能取得“真经”。

六

从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我们自己要把故事说好，做好对外宣传，还需更多地借助外部力量，如请非洲朋友结合自身经历向国际社会传递观点和声音，这有助于增强认同感，也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更能产生文化共鸣，传播的效果也会更佳。今天，中国正快速走向世界，中国的学术界、媒体界、智库界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创新发展思路，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对外交往合作的有效性，真正从变化中的世界来思考和把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用学术和思想、知识与理论为中非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与非洲国家学者们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作与相互支持。

过去10多年来，在创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过程中，我们努力推进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国际化、非洲化进程，让中国的非洲研究更接地气，更接近非洲大陆的实际和中非合作的现实需要。自2010年至今，我院通过各类渠道积极推进非洲籍专业人才的引进工作，现已陆续聘请长期（或短期）非洲籍专家、学者10人。其中多数非洲学者长期在华生活、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在承担非洲研究院安排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余，在非洲研究院的支持和鼓励下，他们还深入中国城市、乡村，调研、考察中国发展模式，学习中国发展经验，撰写心得体会，在国内外媒体宣传、推介中国文化，畅谈自己对中非关系、中非发展的想法和建议，为增进中非友谊和民心相通做出积极贡献。

比如与张勇博士一起联合拍摄制作纪录片《我从非洲来》的索马里学者和丹（Hodan Osman Abdi）博士，就是一个非洲人眼里的“中国通”，她目前在中国许多地方和非洲许多国家都小有名气，甚至被一家埃及的智库媒体评为目前“非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十个非洲女性”之一。她在浙江师范大学读完本科、硕士课程，在浙江大学读完博士课程，然后又入职我院做专职科研人员。久居中国12年，她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会用英、法、阿拉伯等三种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由于在语言上的独特优势，每当有非洲国家代表团来访，研究院都会安排她和毛里塔尼亚籍学者亚黑亚（Mohamed Mahmoud Yahya）博士、马里籍学者约罗（Diallo Yoro）高级研究员一同参加外事接待，为来访非洲友人提供讲解、翻译服务，介绍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协助我们共同做好研究院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交往工作。2016年9月，亚黑亚博士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西湖友谊奖”。2017年10月，和丹博士受聘担任索马里总统顾问，为索政府就索马里国家发展、中国与索马里两国相关领域合作方面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和信息参考。

这些年，在我们非洲研究院，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中非学者合作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的工作局面，比如张勇博士与和丹博士、罗德里格（Taling Tene Rodrigue）博士的非洲影视研究中心团队；迈克（Michael M. O. Ehizuelen）博士与王严博士合作的尼日利亚研究中心团队；雷雯博士与罗德里格博士合作的中非武术文化研究团队；李雪冬博士、黄金宽博士与和丹博士合作的东非区域研究中心团队；牛长松博士、欧玉芳博士与李坤（Osidipe Adekunle）博士的中非教育合作研究中心团队；约罗高级研究员与汪琳博士、罗德里格博士的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中心团队；刘贵今大使、舒展大使、我与格罗布勒大使（Gert Johannes Grobler）的中非关系研究团队等，这种中国和非洲各国学者在非洲研究院内紧密合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中非文化交流与思想共同创造的过程，而张勇

博士主持完成的“重走坦赞铁路”的项目，还是中国学者、非洲学者、欧洲学者三方合作的成果。所有这一切，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本身，就已经在非洲研究院的中非学术合作探索实践过程中获得体现。这些实践活动本身，这些探索过程本身，从学术与理论研究的层面上看，都是十分值得观察和期待的。所以我说，非洲研究是一门“行走的学问”“行动的学问”，只有在行走、行动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形成原创性的理论、思想、话语和知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